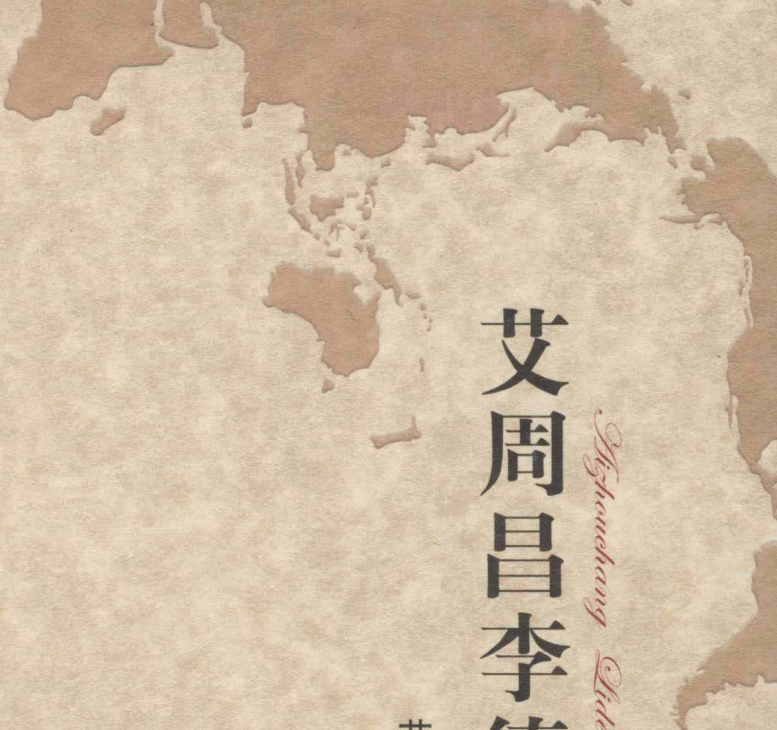




艾周昌李德清文选

Ai Zhouchang Li Deqing Wenxuan

艾周昌 李德清 著

艾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非洲史研究领域，他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为中国非洲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海辞书出版社

Aizhouchang Li Deqing Wenxuan
艾周昌李德清文选

艾周昌 李德清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周昌李德清文选/艾周昌,李德清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326-3623-5

I. ①艾… II. ①艾… ②李…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7212 号

责任编辑 林益明

封面设计 杨 阳

艾周昌李德清文选

艾周昌 李德清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307 000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3623-5/K·859

定价:5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6511611

序 一

艾周昌先生生于1930年8月，湖北省松滋市人。195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至华东师范大学任教。1955年重返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苏联专家科切托夫。结业后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长期讲授世界近代史、亚非史、南非史、亚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等课程。曾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亚非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等职。

艾先生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亚洲史、非洲史和世界近代史领域。

在世界近代史领域，艾先生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与校内和国内的专家一起，编撰、出版了数套《世界近代史》。在“文革”期间，历史学科受到严重冲击，高等院校甚至没有一本像样的世界历史教材。早在1970年，艾先生就协助林举岱教授，主编了近55万字的《世界近代史》，解决了历史系的教材问题。此书不但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材，而且为国内许多高校所采用。此书重版多次，成为“文革”中和“文革”后中国高校历史系采用的较有影响的教材之一。日本东方书店后来翻译出版了日文版。“文革”结束后，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教材又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教育部委托二十所高校历史系合作编撰

中国大学和师范院校的世界史教材。艾先生与刘柞昌、光仁洪、韩承文先生共同主编了教育部统编教材《世界近代史》(上、下册)。这套教材被国内许多高校历史系采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外,艾先生对于世界史的若干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82年发表了《华盛顿两任引退研究》,对于华盛顿在第二任期满后主动引退,给予正面的肯定。文章发表之时,正值“文革”结束后讨论干部终身制,艾先生的论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4年,他又发表了《华盛顿与中国》,不但对于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赶走英国殖民者,创立美利坚合众国,予以高度评价,而且介绍了华盛顿对于中美关系的贡献。1996年,他撰写了《世纪之交——读1871—1900年的世界史》,这篇论文重新审视世界近代史的后半期,阐述了对于这一段时期世界历史发展问题的看法。

在亚洲史领域,艾先生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包括:《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中国》(1981年)、《评叶尔玛克》(1981年)、《试论16至18世纪中叶太平洋航海贸易》(1989年)、《东亚地区的三次历史机遇》(1994年)等,剖析了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历史上环太平洋航路网的形成、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在世界历次现代化浪潮中利用历史机遇的经验教训。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艾先生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委托,组织学生考证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旧址。这一旧址现在已经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这一成果不但丰富了韩国历史的内容,也推动了中韩关系的发展。

当然,艾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还是在非洲史领域。

其一,中非关系史研究。

艾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非关系史。1981年发表《近代华工在南非》之后,又陆续发表了《1898年中刚(扎

伊尔)条约与华工》、《黑人来华考》、《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在中国的反响》、《民国时期的中非关系》等关于中非关系的系列论文。在长期的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推出了中非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两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第一部是1989年出版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这部文选包括五部分内容:(一)黑人在中国;(二)非洲见闻录;(三)时人论说;(四)华工与华侨;(五)中非外交。艾先生自述,经过长期的积累,“约得百万字左右,从中精选编成此书”。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会长的官达非先生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艾周昌同志广搜博采,孜孜不倦,倾十余年之心血,编注了《中非关系史文选》,为研究我国同非洲大陆的交往史辑集了宝贵的资料,为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

第二部著作是《中非关系史》,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首部完整的中非关系史专著。艾先生把中非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即古代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中非关系(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和平友好和平等互惠的。第二时期即近代时期(16世纪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中非关系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表现为一个不能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国与非洲国家殖民当局的关系;第三时期即当代时期,中非关系全面深化,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典型。艾先生在阐述近代中非关系时,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近代中非关系“五百年”中断说,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实中非关系在近代并未中断,只是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中非关系史》的问世,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成为中非关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奠基性著作。

其二,与陆庭恩先生共同编撰《非洲通史》(三卷本)的工作。

编撰一套《非洲通史》,是中国几代非洲史学者的奋斗目标。

1984年召开的西亚非洲史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先生倡议编写一部《非洲通史》,并由艾先生和陆庭恩先生共同主持。此项目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项目”。陆先生和艾先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组织国内三十多位专家学者,花费十余年时间,终于撰写了古代、近代和现代共三卷、192万字的《非洲通史》。《人民日报》专文评论,指出:“(此书)填补了中国对世界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对非洲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此书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励,包括教育部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毫无疑问,《非洲通史》的撰写和出版,是中国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但其中艾先生更是功不可没。

其三,与陆庭恩先生共同编写《非洲史教程》。

“文革”后,非洲史的教学和研究日益普及,但是高校却面临缺乏教材的窘境。1990年,接受教育部的委托,陆庭恩先生与艾先生合作编撰了《非洲史教程》。由于此书结构简明扼要,历史发展脉络清晰,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因此出版后,受到国内各高校的广泛欢迎,成为非洲史教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材。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艾先生先后与他的学生共同撰写了《南非现代化研究》、《非洲黑人文明》、《走进黑非洲》等著作。

艾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非洲史研究领域,他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毫无疑问,他对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舒运国

2011年9月15日

序 二

1977年到1978年,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实现了由1966年“文革”开始时被凝固的“高二学生”到大学本科再到硕士研究生的“三级跳”。

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以后,传来了即将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好消息。我寻访到淮海中路的招生办公室查找招生目录,看到上海师大招收“古籍整理与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心向往之,不管自己有没有把握,当场报了名,同时也记住了研究生指导组负责人裴汝诚先生的名字。报名以后,日以继夜,通读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原著和《中国通史》、《古代汉语》等高校基本教材,还进行了多次古籍标点的练习。第二年6月,为了保险起见,我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先后参加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入学两次考试。在研究生复试时,第一次见到了程应镠、陈九思、颜克述、徐光烈等先生。后来,两场考试均被录取,10月,我终于走进了上海师大的校门,成为“文革”以后第一批研究生,也是上海师大历史上第一次招收的研究生。与此同时,从河南、四川以及同城上海聚集了一批师兄弟,他们是吕友仁、萧鲁阳、俞宗宪、王松龄和朱杰人。裴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极其负责,虽然本校已有充足的指导老师(陈九思、颜克述、徐光烈、吴绍烈和裴先生等都精心准备,为我们上专业课),仍然礼聘多位

校外教师为我们讲授专业课程,其中有章太炎弟子王乘六老先生的文字学课、华东师大著名教授程俊英先生的诗经课、甘肃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郭晋稀先生的古音韵学课以及胡邦彦(《说文》)、江辛楣(诗词)、陈光贻(方志学)等先生的绝学,而当时正在参加《续资治通鉴长编》整理工作的华东师大李德清先生的历史地理学课程则是堪称治学工具的重要课程。这门课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如宋史学界泰斗邓广铭先生所说,历史地理是治史的几把“钥匙”之一,我们在后来的工作和研究中,时时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之所以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李先生无疑是启蒙者和领路人。

李德清先生于1953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通史研究班学习。1956年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做谭其骧先生的助教,兼系秘书工作。1958年开始与十几位学生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写工作,并与林汀水同志一道负责辽金部分。李先生跟随谭先生工作了整整五年,深深地受到了老师的熏陶,以致后来的学术研究,多与中国历史地理有关。1961年经华东师大和复旦两校领导同意,市教委批准,李先生调入华东师大,担任两年“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副主任。1972年师大成立古籍研究所,李先生又调入该所,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一直到退休。李先生参加古籍整理,点校、复看、定稿约二百余万字,撰写校勘记约数千条以上。其中有:《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列传的一部分,《新五代史·职方考》,《王文公文集》(点校18卷)、《容斋随笔》、《樊南文集》,以及《齐东野语》、《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之《舆地考》、《经籍考》共110余卷定稿。裴汝诚先生之所以能请到李先生来给我们上课,正是因为主持《续资治通鉴长编》整理工作的关系。李先生的论

著主要有专著《古代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论文《简评〈太平寰宇记〉》、《学点历史地理》、《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中国古籍中“占腊”一名始见考》、《宋代女口考辨》、《〈舆地纪胜〉的成书年代》、《评开禧北伐三说》、《〈博野军考〉质疑》、《地名避讳辨证举例》等。在华东师大教学和古籍整理工作中，李先生参与集体项目工作是主要的，下的力气最大，论著仅为余事，然亦多所创见。有些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史学前辈的好评，被誉为“七国院士”的夏鼐先生认为两文（《宋代女口考辨》和《中国古籍中“占腊”一名始见考》）“都能广泛搜集资料，以订正前人旧说，立论谨严。”^①

李先生的学术成果，大多荟萃于本书之中，其最重要的专著《古代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虽然没有收入，但由该书前言和论文《地名避讳辨证举例》中已可窥见此学之精要。其他不管是考证性的、通识性的还是通俗性的文章，如《我国古代的导游》、《旅行家——司马迁》、《航海家——汪大渊》等，都是严谨简明，对学术有益。李先生的论著，虽早已出版或发表，但如今已难于读全，此次结集，无疑是学界之幸事。

我于1981年毕业以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了十六年编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当了八年社长兼总编，又进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了四年总编，现在则终于如愿回到了学术研究领域，承担了多个课题，李先生等老师给我的知识和方法，在这几十年中始终与我的职业生涯相伴，终生受益。

我曾经不自量力地为几位前辈学者的论著作序。说不自量力，是因为作为后生晚辈，我本无此资格，更无这样的学术地位。

^① 见《夏鼐给李德清的信（1983年12月1日）》。

这其中有郑炳中先生、陈克俭先生、林其铨先生，现在又有了李德清先生。不过对于我来说也有好处，可以重温这几位先生的大作而得到新的教益。老师给我的教诲我时时不敢忘却，而学无止境才是硬道理。

李伟国

2011年9月14日

目 录

序一(舒运国)	1
序二(李伟国)	5

上部：艾周昌文选

论基马尔革命	3
美国对非洲的早期侵略	16
近代华工在南非	20
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辛亥革命	31
关于近代非洲殖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40
恩克鲁玛	52
1898年中刚(扎伊尔)条约与华工	57
近代时期的中国与非洲	65
非洲黑人来华考	77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在中国的反响	87
试论 16 至 18 世纪中叶太平洋航海贸易	93
19 世纪非洲国家改革散论	104
殖民地时期加纳土地制度的变化	114
杜环非洲之行考辨	125
南非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	132
民国时期的中非关系(1911—1949)	143

中非关系史的分期与研究	155
关于非洲法系的若干问题	161
渐进论思想的历史演进	168
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	177
《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研究》序言	188

下部：李德清文选

我国古代旅游浅谈	195
简评《太平寰宇记》	199
学点历史地理	210
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	215
中国古籍中“占腊”一名始见考	225
宋代女口考辨	229
《輿地纪胜》的成书年代	241
评开禧北伐三说	246
《博野军考》质疑	257
地名避讳辨证举例	261
《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前言	270
编后记	273

上部：艾周昌文选

论基马尔革命

这篇文章是一篇不成熟的习作。最初,在讲授土耳其史中遇到了若干问题,翻阅了一些苏联学者的著作,尤其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的学习中有了一些非常粗浅的体会,整理成为一篇文章。后来在讨论新编世界现代史中学课本初稿时,觉得这篇文章或许对中学教师将来讲授这一段教材时,能提供若干材料,故发表出来供同志们讨论和指教。

一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19—1922年土耳其爆发了以反帝为主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个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即基马尔革命,基马尔革命是土耳其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准备好了的。

土耳其在大战前为奥斯曼帝国,兴起于13世纪,在小亚细亚“建立了强盗性的国家”^①。初期强盗性的奥斯曼国家,东征西略,逐渐成为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封建神权专制大帝国。当土耳其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时,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因此,这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在17世纪落后了,衰落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利用“特权条约制度”,另一方面直接组织战争冲击,一步一步地把土耳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推销市场、原料来源地和资本输出场所。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土耳其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使得土耳其的农村卷入到商品经济中去。同时,在外国商品的打击之下,旧的手工业日益破产。例如19世纪初阿勒颇每年生产的纺织品达1亿佛朗,而40年代仅及700万佛朗了。

① 《马恩文库》卷五,第223页,转引自塔森格著:《土耳其》,1949年莫斯科版,第5页。

在斯库台里和泰诺夫的 2 000 个纺织作坊只剩下 200 个,而有 1 800 个停止了工作。自足自给经济的破坏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已经有了几个官办工厂和一些商人经营的小企业。到 20 世纪初期,土耳其的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微弱的发展。土耳其的封建社会趋于瓦解了,从封建社会内部滋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是,资本主义并未代替封建主义,而且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封建的剥削关系还在土耳其牢固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土耳其变成半封建的社会了。

同时,帝国主义以其军事的政治的压力和经济力量的优势,控制着土耳其的经济命脉,操纵土耳其的政治,外国银行家的“奥斯曼帝国债务管理处”,控制了土耳其的全部财政,一切税收和供品都流入“奥斯曼帝国债务管理处”的仓库。外国资本家通过债务管理处深入到土耳其经济的各个部门。在欧战开始时,奥斯曼帝国的债务总额为 158 642 738 金镑。除此之外,外国资本投资于土耳其经济的各部门,银行为 1 021 万金镑,铁道为 3 916.3 万金镑,商业为 559.3 万金镑,工矿为 549.5 万金镑,城市建设为 498.3 万金镑。这样一来,土耳其的经济就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能独立自主。土耳其仅仅维持着独立的形式,实质上已经变成为列宁所称之为“中间形式”的半殖民地国家了。^①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没有摧毁旧的封建基础,反而使封建剥削加重。在农村中,占农户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封建地主,掌握着三分之二的可耕地残酷地剥削农民。他们在政治上享受着各种特权,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官吏为他们服务。他们构成封建政府的主要支柱,而土耳其的苏丹则是他们的最高体现者。土耳其的封建地主,如果说在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与外国帝国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还企图实现一些改革的话,那么在 20 世纪,他们完全向帝国主义投降了,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土耳其人民的代理人。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土耳其形成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在买办资产阶级中占优势的并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资本家剥削土耳其人的代办,也是反动的苏丹政府的支持者。

体现土耳其伊斯兰教封建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最初是“自由与协调”党,在 1908—1909 年革命以后,则是“青年土耳其党”和“自由与协调党”了。

土耳其在 20 世纪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构成居民的多数,占总人

^① 参看《列宁文选》第 1 卷,1950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989 页。